

维尔默对阿多诺审美现代性方案的重构及启示

孙琳琼

摘要:法兰克福学派早期思想家对工具理性的批判蕴含精神跃迁的意向,这种意向体现为本雅明以弥赛亚精神对抗工具理性,也体现为阿多诺以艺术模仿持存真理。维尔默指认两种路径作为“审美主义”和“弥赛亚主义”的虚假二难选择,并以后形而上学现代性方案重点重构了阿多诺的审美现代性方案。维尔默通过真理观转型将阿多诺“艺术展现非和解世界”转化为交往性艺术真理,强调主体间对话实现真理性内容;通过理性范式整合打破审美理性垄断,主张科学、伦理、审美等多元理性平等共生,形成复调而非对抗的理性星丛。在实践层面,推动大众文化民主潜能释放,使艺术从精英堡垒转向公共领域;在理论层面,以“视角阐释”替代线性对抗,既保留阿多诺“非同一性”批判精髓,又通过承认启蒙价值与吸纳后现代差异诉求,构建开放包容的现代性形态,为全球化文化冲突提供非暴力整合路径。

关键词:维尔默;审美现代性;审美主义;弥赛亚主义

作者简介:孙琳琼,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天津 300401)

基金项目:河北省宣传文化专项“批判理论视域中维尔默政治美学思想研究”

DOI编码: 10.19667/j.cnki.cn23-1070/c.2025.04.003

审美现代性作为启蒙现代性的反思力量,深嵌于现代性自我批判的基因序列之中,作为对工具理性扩张的抵抗性力量,始终以其独特的自主表意实践参与社会现代化进程。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理论家对工具理性展开的深刻省思,却陷入双重困境:本雅明将弥赛亚主义投射于历史哲学,试图以弥赛亚精神唤醒被工具理性窒息的救赎潜能;阿多诺则退守审美主义堡垒,将艺术的真理性囚禁于“非同一性”的绝对否定中。二者看似是对立的方案,实则共享着同一性思维的桎梏,或以弥赛亚的终极和解消解历史张力,或以审美乌托邦的绝对自律割裂艺术与现实。在维尔默看来,这种“非理性对抗理性”或“审美理性超越工具理性”的选择,实为“一个虚假的二难选择”,要走出这个虚假的二难选择,需要“再一次破除阿多诺的和解观念的神话,并将其带入理性概念中”^①,这里设想的不是对工具理性的单一超越逻辑。

① 阿尔布莱希特·维尔默:《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辩证法:遵循阿多诺的理性批判》,钦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82页。

辑,而是一种兼容并包的、多种理性开放的互动状态。为此,维尔默通过“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辩证法”,促成工具理性、审美理性与交往理性的共生,使现代性“进步”承诺摆脱教条空洞化,成为持续自我更新的动态进程。维尔默的方案既拯救了阿多诺美学中的否定性批判内核,又通过交往实践弥合了本雅明救赎愿景与现实脱节的困境,在生活世界的交往实践中为破碎的现代性图景铺设了一条非暴力的整合路径,也为我们理解和把握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当代走向提供了启示。

一、模仿认知与审美综合:阿多诺审美现代性方案的双重逻辑

西方审美理性的传统植根于古希腊悲剧,并在思想史中延续发展。尼采以带有权力意志色彩的“诗歌理性”回应传统理性,康德通过审美判断与崇高判断连接认识与道德、知性与理性,席勒则以艺术的“游戏冲动”弥合感性与理性的分裂。对审美合理性的思考贯穿阿多诺的审美现代性方案,既体现对传统审美理性范畴的重建,也表征以审美反思寻求启蒙理性救赎的路径。

(一)审美合理性的双重逻辑:模仿认知与社会批判

在阿多诺看来,审美之所以具有合理性,是因为“模仿的继续存在把艺术界定为一种认知的形式以及‘理性的’东西”^①。艺术之所以能够化为认识,是因为艺术、社会与知识三者密切相关。在阿多诺看来,“艺术之所以暗示现实,是因为艺术是一种认知形式。认知必然关涉现实,现实必然关涉社会,因此没有不具有社会性的现实”^②,也就是说,艺术能够通过模仿将对本质的把握上升为知识,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现代艺术。这是因为现代艺术具有与同一性思维不同的内在发展逻辑,在艺术生产过程中现代艺术呈现出双重特征,“一方面是自律实体,另一方面又是社会事实”,即现代主义艺术应将自身作为社会现实的一个“他者”位置而存在,当它在不担任被给定的预设时,当它与社会现实的种种期待隔离时,才会处于一种自律性状态。因为当现代艺术与外界真正发生关联时,艺术中的张力就会凸显,使得现代自律艺术能够站在社会的对立面,以否定的形式召唤理性,这样才能够以客观的视角将曾经属于全人类共享而后被启蒙所遮蔽的经验得到彰显。正因如此,“审美合理性”能够凸显艺术中的非理性、不确定性部分的功用,以“通过各种范畴对其产生阻碍作用……将认识范围扩展到一个据说是并不存在的领域”,进而“摧毁了与知识相对的独特性与单义性”^③,进而实现对理性自身的限制,为知识生产开辟空间。因此,阿多诺尝试以“审美合理性”来弥合横亘在感性和理性之间的鸿沟,使由理性分化而成的知识、社会现实、艺术领域在一个再现空间中充分融合。

(二)审美综合:真理把握与非暴力和解

那么,审美合理性又如何把握真理?阿多诺认为,艺术的模仿行为要通过一种以精神的“和解”为目标的“审美综合”来实现。只有通过审美综合这一具体的审美活动过程,艺术才能完成对现实的真实性认识,现实也同时得以实现。然而,审美综合与概念性思维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在面对非同一性事物时呈现出非暴力特征。在阿多诺看来,“‘和解’的精神是艺术和哲学的共同手段”^④,是“两者共同通往真实的化身,共同的遁点,共同的乌托邦”^⑤,这种非暴力的“和解”精神内在于阿多诺理论框架之中。但对于和解是真实还是表象,哲学与艺术又是否能够真正承担起拯救理性的重任,阿多诺的态度是矛盾的,但有一点他是肯定的,即现实已不再具有真正和解的可能了,而艺术的和解表象反而是真实的。

阿多诺认为,如果真实的意思是忠于现实,那么它必须将现实作为某种非和解、对抗性的、破裂的

① 阿多诺:《美学理论》,王柯平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6页。

② 阿多诺:《美学理论》,王柯平译,第441页。

③ 阿多诺:《美学理论》,王柯平译,第96页。

④ 阿尔布莱希特·维尔默:《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辩证法:遵循阿多诺的理性批判》,钦文译,第170页。

⑤ 阿尔布莱希特·维尔默:《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辩证法:遵循阿多诺的理性批判》,钦文译,第170页。

世界展现出来,^①同时这种展现必须以和解精神为指引,并通过非暴力的审美综合将破碎的、非同一的现实整体展现出来,从而创设和解的表象。审美综合因对其自身的原则提出质疑而得以成功。现代艺术中的解放潜在在对某种客观上具有某种约束力的意义的否定中得到呈现。具体而言,就是对象征秩序的合理化提出质疑,在象征秩序的诸多规范中,启蒙揭示了隐匿于虚假完满性秩序下的暴力成分。现代艺术的开放性建基于具有解放维度的审美意识之上,是批判具有总体性特征的象征秩序的虚假和暴力性。另外,在工具理性批判逐渐深入的过程中,艺术只能通过“非和解、对抗性的、破裂的”^②方式应对人在工具理性压制下无能为力的境遇,除此之外别无它途。这样一来,现代自律艺术就被赋予了社会解放的使命,从而促成人的解放。

(三)双重辩证法的困境:乌托邦与规范性的张力

阿多诺拒绝形而上学与现代性,但延续了黑格尔对真理(和谐)的冲动。他放弃以哲学概念把握真理,因概念媒介易倒退至意识哲学立场,最终只能把调和的思想交给审美经验。在他看来,美学与艺术是非同一性原则的最好看护。然而,审美经验无法为难以经受哲学批判的内容带来可靠性,如此一来,阿多诺也就无法在阐释审美调和和破译观念时放弃哲学术语的使用。由此,他以概念的辩证法策略寻求作为理性的“他者”的美学乌托邦。他对艺术或审美的哲学反思涉及双重辩证法,即艺术自身的内在辩证法(星丛关系)和艺术与社会现实的外部辩证法(否定关系),这种双重性是各自以对方为前提或实现形式。两种辩证运动的结果是和解原则与希望的确立,它在非同一性的否定辩证法引导下,通过现代自律艺术呈现出的真理性内涵和批判性张力展现自身。

事实上,以阿多诺和本雅明为代表的早期思想家的主要兴趣并非在艺术本身,而是通过对理性的批判,期冀为理论重新找到一个基础支点,本雅明试图通过把握神学与现代性的紧张关系。以弥赛亚时间结构中的张力反思现代性,同时探寻历史本身的动力来源,即便在完成马克思主义转向之后,他仍然坚持以神学潜能探索真理,持存对弥赛亚救赎的渴望。与本雅明不同的是,在阿多诺这里,这个支点必须是理性的,不能是非理性的神秘启示物,更不应该是形而上学的存在。它不在现实中,但又不能是主观主义的;它是艺术的,又不能在艺术作品中被直观。它又不能被社会化,需要在远望现实中保存真理的希望,这种抽象性使其无法为理性与真理提供规范基础,最终陷入“意向有余而定位不足”的困境。本雅明与阿多诺思想的差异性凸显审美现代性方案的内在矛盾,也映射出法兰克福学派早期思想家面对现实时的无力感,如何为现代性重建提供具有实践潜能的规范性视野成为学派接续思考的重点。

二、真理转型与理性共生:维尔默对阿多诺方案的重构路径

(一)揭示阿多诺的现代性拯救方案的内在矛盾

在维尔默看来,阿多诺在批判现代性中的同一性哲学的同时,又不想完全否定现代性所蕴含的内在价值。他试图通过概念内部运动的规律来挽救现代性。尽管这一拯救的初衷是积极的,但由于未能找到真正突破主体哲学的方法,为避免理性的工具化,他将打破同一性思维的希望寄托在了艺术模仿上,但问题在于,“即便思想与不能从外部确定的调和观念保持一致,思想又该如何通过自身中的话语,而非通过‘默然回忆’中的直觉,来把模仿冲动转换成为认识呢?”^③理论话语不能是传统的概念式的论证逻辑,因而只能是一种星丛式的结构,这导致阿多诺的审美策略从内容到形式上都充满了矛盾。

维尔默指出,由于阿多诺认为“同一性”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压迫性,因而只能通过蕴含在艺术作

① 阿尔布莱希特·维尔默:《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辩证法:遵循阿多诺的理性批判》,钦文译,第13—14页。

② 阿尔布莱希特·维尔默:《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辩证法:遵循阿多诺的理性批判》,钦文译,第13—14页。

③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1卷,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67页。

品中的审美合理性来替代原有的合理性,如此一来,艺术作品也就成为了社会解放的中介,阿多诺的这一做法是以审美合理性来取代工具合理性,但是即使这一替换能够使和解的希望的艺术作品中浮出水面,但它并不能将现实的个体活动纳入其中,也就是说,审美合理性在拒绝工具理性的同时,依然没有解决主体间的互动交往问题,艺术作品因其自律性在拒斥社会现实的同时,也将个体排除在外。如维尔默所言:“如果美是幸福的诺言,是与我们的内在和外在在本性的调和,那么艺术作品就是这种超越性体验的媒介,而并不就是调和的模式本身。这是因为,最低限度地说,艺术作品的审美综合只能作为对话关系的‘道德’综合的中介而不能把后者呈现出来。”^①而按照阿多诺的设想,集体的“我们”取代了个体从而成为艺术作品中的发声主体,这样的声音依然是趋于同质的,这样一来就不可能呈现出多种异质性声音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审美综合不是摆脱压迫的社会状态的可能模式,与此同时在艺术作品中,承认、解缚以及主体间链接的观念也只能表现为某种超人类的状态,而非具体个体的主体间的互动。

维尔默指出,马克思以及诸多批判理论家在对社会进行分析时,均基于某种规律性的规范解释,这就造成了社会的透明性,虽然维尔默并非像后马克思主义学者那样主张社会的不可能性,但也指出了这一路径在其理论的完满性与社会现实之间关联的某种失败。因为他们都接受了一种不允许必要分析的框架分析范畴,尽管这种分化能够正确地解释现代合理化过程的矛盾性和含糊性。这也造成了在对工具理性的态度选择中只能是非批判的肯定或者是彻底的否定。批判理论家共同具有的批判和乌托邦的冲动不可能在一种单维合理性观念的概念框架中得到充分表达。维尔默指出,哈贝马斯对现代化进程中客观理性的分裂作出了分析,总体的理性分化为科学技术合理性、实践道德合理性和审美合理性,同时维尔默认为,若想克服这种分裂现象,仅仅依靠其中的某一种合理性所提供的社会转型方案是不能够完成的。如果将审美体验解释成空间和实践的调和,这样做的代价是再一次丧失对解放的历史谋划的政治维度。

(二)探索交往理性与审美辩证法的融合路径

为此,维尔默尝试将交往维度融入阿多诺的美学和解路径中。不同于哈贝马斯对阿多诺审美合理性观念的批判,维尔默力图实现阿多诺与哈贝马斯两种理论进路的结合,认为只有继承并发展阿多诺的审美合理性观点,审美乌托邦才具有可能性。在维尔默看来,阿多诺以“审美合理性改造工具合理性”,从而拓展到社会改造的设想有其合理性所在。因为阿多诺在对音乐以及建筑的分析中已然指出,艺术本身就蕴含着工具合理性,音乐、建筑等艺术表现形式中的技艺与建构的成分,使得工具合理性上升为超越同一性的审美合理性成为了可能。但维尔默认为,这种构想是不可行的,因为“模仿冲动与合理性因素之间的互动”不可能“产生一种非压迫性的社会整合形式”^②。原因在于这一互动“虽然代表着不同的生产、行动和思考的取向,但它们不可能代表两种必择其一的社会整合形式”^③。如此一来,“历史性的解放事业的政治维度再次丧失了”^④。究其原因,维尔默认为,审美合理性在阿多诺的设想中失去了开放性,而要以审美合理性对诸多其他合理性进行改造,就不能失去对话的维度。因此,维尔默认为,仅仅以审美合理性超越或扬弃工具合理性这一路径略显简单粗暴,而是要拒绝单一理性,并在一种

① 阿尔布莱希特·韦尔默:《后形而上学现代性》,应奇等编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77页。

② Albrecht Wellmer, “Reason, Utopia, and the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in Richard J. Bernstein, *Habermas and Modernity*, Oxford: Polity Press, 1985, p.64.

③ Albrecht Wellmer, “Reason, Utopia, and the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in Richard J. Bernstein, *Habermas and Modernity*, p.49.

④ Albrecht Wellmer, “Reason, Utopia, and the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in Richard J. Bernstein, *Habermas and Modernity*, p.65.

兼容并包的状态中形成多种理性的开放互动与对话。要明晰维尔默对于阿多诺美学困境的拯救以及如何将阿多诺与哈贝马斯相结合从而重构“审美合理性”,需从维尔默对艺术真实、艺术作品与艺术形式三个角度展开理解。

首先,维尔默基于审美表象辩证法视角探讨艺术真实问题。他将真实与表象看作阿多诺所说的和解之相互冲突的两极,认为对阿多诺来说艺术真实、表象、和解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矛盾,构成审美表象辩证法。作为一种结构性冲突,审美表象辩证法根源在于艺术与真理(真实)的纠葛。维尔默认为,艺术并不直接把握“真理”,而是通过真理所显露出的现实(真实)来暗示真理,或者说在艺术作品中“真理”是通过它所显露出来的现实表明自己的存在。然而,“作为某种独一无二的东西”,艺术作品的真理(真实)内涵取决于“现实不被歪曲,现实按照其自身的面貌在真实内涵中得到体现”^①。这意味着,一旦现实是被歪曲的,一旦艺术不是对真实的真正表现,那么真理就将从艺术作品中逃离。反之亦然,如果艺术作品中没有真理的存在,那么它所遭遇的就是一个被歪曲的现实,或者说被歪曲的现实在艺术作品中没有得到真正的表现。然而,在这个被统治的世界中,艺术及其审美活动只能以矛盾的方式存在:它在极力追求真实的同时,又只能以表象的方式呈现自身。以拉康的三界域说来解释,实在界的内容一旦进入象征界就必然会遭遇阉割与失败,表象只能通过能指的不断失败来标示真实的位置,真实与虚假的要素在“美”中是相互交织的关系。这里的艺术真实意指某种“拯救之光”,只有在这种真实之光的照耀下,现实才能不被歪曲理解。因此,艺术真实体现的是具体作品中的真理性内容,它是和解的乌托邦内涵,但其形式则是表象,因而,艺术作为一种矛盾的存在,即艺术以表象的形式持有真理性内容,进而展现乌托邦维度。这个表象的虚幻领域以其真实的真理性存在执行这一批判功能,“即对非和解现实的否定”。由此,在解构基础上重建阿多诺的“真实、表象、和解的内在关联”的乌托邦内涵,成为维尔默将阿多诺审美乌托邦向现实推进的重点,审美表象辩证法也使得艺术真实的维度重新被重视,艺术、审美活动的和解维度也由此展现自身的可能性。

其次,为实现对阿多诺的继承,维尔默试图继续从艺术作品中寻找解放的潜能。他认为,艺术作品是非物化认知的重要媒介,它以非强制的方式将部分整合到整体中,展现了独特的典范意义。然而,要全面理解和阐释艺术作品中真实的潜力和要求,我们必须回溯到错综复杂的生活历史背景中,深入体验不同真实性维度间的冲突与变迁。正因如此,维尔默主张在艺术的影响和表达中实现多种真实性维度相互交织,我们对艺术真实的探索不应脱离生活实践中的艺术视角;同时,阿多诺的理论应从那些被视为不可思考的领域中回归到可思考的范畴。此外,维尔默还观察到,阿多诺虽然已经将现代艺术的公共形式与主体性形式相联系,但其理论发展受到了限制,因为他在认可现代艺术的同时却又否认了现代社会的价值。为了克服这一局限,我们需要扩展主体的边界,并在此基础上打破启蒙命题的单线性决定方式。在维尔默的视角下,如果我们为了交往合理性的维度而拓展阿多诺的合理性概念,那么真实美学的范畴也将随之扩展。因此,通过在艺术、现实与乌托邦三者相交融的场域中,亦即在艺术作品中纳入生活世界中的互动主体,我们可以重新构建阿多诺原本单向度的辩证法,推向更加多元化的效果境界。

最后,前文对于艺术真实以及艺术作品的讨论已然显现出拯救的潜能,而要将之作用于主体,仍需对开放的艺术形式进行阐释。为此,维尔默引入伯勒尔、姚思以及比格尔对阿多诺的批评。尽管三位思想家对待阿多诺的态度不尽相同,但却呈现了一种整体倾向,即放弃甚至不再接受阿多诺的乌托邦

① 维尔默:《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辩证法:遵循阿多诺的理性批判》,钦文译,第13页。

视角,并试图用“现实、艺术、生活实践的相互关联代替阿多诺的真实、表象、和解的内在关联”^①,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形式只能以主体间交往的介质存在,而无法承担和解的功能,从而只能作为主体形式与社会化形式互动中的补充成分。维尔默认为,对于艺术作品的欣赏,亦即在审美体验中不能仅仅依靠主体沉浸于作品之中从而再造客体,而应在一种复调的、具有交往性的作品中释放作品的审美能量,使得作品在审美环节中影响主体间的审美理解,如此一来,单一的审美主体就变成了多维的共存。在将交往纳入审美主体与艺术作品之中后,艺术的开放形式“不仅仅是非中心化的主体和无序的世界在美学上的反映,而且这种形式还以其独特的无序性与主体间产生了一种新的可能的接触”^②。不仅如此,维尔默还认为,通过充当社会上不同个体之间的交往关系的“媒介”,艺术也能够重新进入生活过程。维尔默认为,我们有可能在现实中发现艺术与生活世界之间关系转型的迹象,“从这些迹象出发,我们就可以为这一观点(即认为艺术和生活世界的关系是可以改变的)辩护,在此观念的指引下,一种民主的生活实践将会充分挖掘出艺术的革新和交往潜力”^③。在这样一种拒绝封闭的艺术形式与开放结构中,全新的活动空间得以展现。这样一来,无序的、封闭的内容就得以呈现在非强制性的交往场域中。由此,“在交往中流动的”自我同一性取代了凝滞的资产阶级主体,从而预示出新的组织形式,并通过延展主体的活动空间,打破主体与无序的、破碎的内容之间的单向度关系,使得主体交往合理性得以彰显。

三、公共领域的感性革命:维尔默方案的双维启示

走出审美主义和弥赛亚主义的二难之境,意味着艺术和审美向生活的一种回归。立足维尔默对阿多诺审美现代性方案的重释,我们可以窥见法兰克福学派在推动批判理论走向现实的尝试,呈现出一条连贯且递进的线索,以阿多诺试图在社会现实之外寻找理想性“飞地”为开始,经哈贝马斯借助交往理论对这种理想性的批判性反思,到维尔默将哈贝马斯与阿多诺相结合,重新建立起审美活动与现实之间的关联,推动审美维度嵌入生活实践。这一理论趋向既推动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走向,也体现了当代美学发展的整体趋势。

(一)美学叙事与政治逻辑的视域融通

如前文所述,艺术并非仅在观念的维度对理性内容进行反思,艺术模仿还聚焦于社会解放问题,这就意味着双向运动,一方面需要在艺术层面对社会真实的呈现,另一方面还需要对社会现实作出分析,这包括政治、经济、技术等诸多领域,否则审美活动提供的和解图景只能成为具有某种超越性的乌托邦存在。对此,维尔默作出了理论尝试,“他肯定阿多诺对文化工业批判的合法性,也指出阿多诺对大众艺术民主潜能和审美想象力的忽视”,同时,“他肯定本雅明关于机械复制艺术暗示着现代大众艺术潜能的分析,也指出本雅明的审美政治化动机”^④,通过对二者的批判以及对哈贝马斯语言学转向的充分吸纳,他推动美学走向政治实践,用“多元的、公共的合理性”重建批判理论规范基础的理论规划,以激活美学潜能从而赋能多元真理和有效性的开放性对话,建构话语伦理学的理论活力和优势,为美学潜入政治推动实践共识提供了路径思考。

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语境中,美学走向政治已经是不可避免的问题了。在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和美学研究领域,关于审美和政治的关系研究已经成为当代美学研究新的热潮,相关理论著

① 王凤才:《“为艺术而艺术”还是“艺术回归生活”——比格尔对唯美主义和先锋派的批判性重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年第5期,第164页。

② 阿尔布莱希特·维尔默:《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辩证法:遵循阿多诺的理性批判》,钦文译,181—182页。

③ 阿尔布莱希特·维尔默:《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辩证法:遵循阿多诺的理性批判》,钦文译,第41页。

④ 杨丽:《重建法的规范性基础:哈贝马斯法哲学思想探源》,北京: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21年,序二第40页。

述也不断涌现。^①美学融入政治生活,通过参与政治实践改变人们视听言行,提升人们采取立场的能力,进而促进民主生活实践,使美学研究走出传统的社会美学的理论范式 and 美学范畴限定。的确,政治需要依据一系列概念术语才得以被理解,如民主、平等、公平、自由等概念,但政治中也“有一些问题只是在审美维度中才能得以显现,如融合的问题、判断问题、回应与接受问题,显现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是“一般的政治的审美维度的意义和范围的问题”^②。政治同样蕴含着某种对话性和共识性维度,而审美的艺术活动则可以从处理感性的分享与分歧的角度把这种对话性和共识性提出来,并建立起思想对话的联系和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审美叙事与政治逻辑的相互融通实际上是走向了一种“大美学”研究视域,既不单纯从政治或美学的单一视角来理解审美与政治的关系,也不是必然要求二者的现实联盟,而是广泛地考察当代西方政治思想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形势之后的一种视域融通。

(二)感性超越与理性规范的动态平衡

虽然哈贝马斯和维尔默都强调以多元理性扬弃阿多诺视域中的单一理性,但哈贝马斯更侧重理性的规范建构,维尔默则更倾向于理性的自我超越与反思,这种超越中蕴藏着对审美合理性价值定位的期冀。问题在于,以感性方式呈现的现实如何具有真理性?从韦伯将合理性分为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并对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工具理性不断膨胀及其带来的“意义丧失”的揭示,到哈贝马斯从行为合理性、目的可行性和行动有效性的角度诠释合理性内涵,并以价值目标为导向的沟通行动的实施,此时的合理性已然不再单一地表现为工具理性策略性建构社会系统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借助建基于语言性和主体间性之上的交往理性对生活世界的理性建构,体现为科学与道德、解放和自由理性平衡制约的双重进路。政治生活领域对“理解”的规范性定位,完全不同于对有效性、正当性和公正性的规范性定位。后者以规则或法律的规范性为基础,这类实践能够被程序化,能够表现为程序理性,但反思性判断不可能被程序化。

事实上,今天的我们似乎正处于从理性到更高感性的螺旋上升发展阶段,随着“可感可行”成为时代趋势,我们见证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篇章正在缓缓展开。这种趋势不仅深刻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对社会各个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经济学领域。传统的经济学往往强调以资为本,侧重于工具理性的实证研究,追求经济效率与物质增长的最大化。然而,在感性超越与理性规范的动态平衡下,经济学似乎也开始了一场“审美转向”。这一转向不仅是对经济活动的重新认识,更是对人类需求和价值的深入挖掘。经济学开始关注人们的幸福感、满足感和生活质量,而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积累。经济政策的制定也开始更加注重整体宏观政策取向与个体微观政策感受之间的协同性。这意味着,经济政策不仅要追求经济增长,还要关注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可持续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政策制定者将感性因素纳入决策之中,开始研究人们的情感、文化和心理需求以及这些需求如何影响行为和决策。这种转变不仅为以经济学为代表的实证科学研究带来了新领域和新视角,也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更加全面和人性化的指导。我们相信,感性超越与理性规范的动态平衡,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人类需求和发展,才是推动社会向更合理方向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

(三)艺术活动到社会文化的理论跃迁

在当代理论的发展脉络中,我们见证了美学研究的重心从艺术转向文化的显著跃迁。当我们在谈论艺术的时候,事实上指的是文化,但文化的相对性以及过于宽泛的内涵,使当代的文化研究范式的美

^① 如美国学者克里斯宾·萨塔维尔的《政治美学》、荷兰学者F.R.安科斯密特的《审美政治:超越事实和价值的政治哲学》、雅克·朗西埃的《歧义:政治与哲学》、《美学的政治:感性的分配》、阿鲁达提·维曼尼的《政治美学:文化、批判和日常生活》、凯南·弗格森的《判断的政治》等。参见尼古拉斯·康普雷迪斯主编:《政治思想中的审美转向》,谢卓婷等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20年,第2页。

^② 尼古拉斯·康普雷迪斯:《政治思想中的审美转向》,谢卓婷等译,第8页。

学缺乏美学应有的审美标准和核心价值,如何用更有说服力的理论去解释和阐释当代艺术文化现象。法兰克福学派始终致力于揭示文化与社会、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他们认为,文化不仅是艺术和审美的表现,更是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的反映。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谈论艺术实际上就是在探讨文化,而文化现象的背后则蕴含着深层的社会政治意义。文化不仅是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的反映,更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人们进行交流和沟通的重要媒介。文化是一个开放的、多元的、不断变化的过程,它不断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地塑造和重构着社会。当代文化现象往往受到商业化和消费主义的影响,失去了其应有的审美价值和批判性。文化是一个多元且复杂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都极为宽泛。文化不仅是一个过程,更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领域。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通过文化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和利益,同时也受到文化的影响和塑造。因此,对文化现象的批判性解读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其背后的社会政治因素,还能促进我们对文化进行深刻反思和重新理解。艺术活动到社会文化的理论跃迁是一个重要的学术现象。在这一转变中,维尔默的思想为我们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视角。他强调了对文化现象的批判性解读和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不仅推动了美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也为我们理解当代社会文化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工具。有别于当代后现代思想家的激进路径,维尔默意识到仅仅依靠审美现代性无法消解现代性的诸多问题,同时启蒙现代性的积极性也不能被片面地否定,因而我们应在此基础上考察如何以审美现代性拯救启蒙现代性,而非对启蒙现代性弃置后转向审美现代性这种简单化处理。这正是我们有别于一些激进的后现代路径的关键所在。

(四)艺术真实对现实和解的理论观照

艺术真实究竟能否通达真理?对这一问题的理论反思有助于激活我们对艺术功能和真理本质的思考。我们首先借助于席勒的观点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理解。席勒认为,艺术的本性是一种“审美假象”。“美的艺术的本质就是假象”,艺术正因为它的假象才获得人们的欢喜。这种假象不同于“逻辑假象”,逻辑假象混淆了真理与现实,它是某种“欺骗”,而审美假象则发挥着某种特别的作用,它不会损害真理,因此,我们既不能因它是假象就去鄙视它,否则就等于“鄙视一切美的艺术”,也不能把知性的实在性原则运用到艺术中,因为“假象既不想代表实在,也无须代表实在”,一旦审美假象被作为一种实在性运用时,假象就会成为某种“达到物质目的的一种低劣的工具”^①。席勒反对把艺术假象当作逃避现实的避难所,或者错误地把它当作实在性的补偿。正是这种假象使美成其美,艺术成其艺术,使得它把自己同知识与道德区分开来,艺术能够在“没有道德的地方补充道德”,在“有道德的地方减轻道德劳作的的能力”,实现对知识的照顾。

事实上,美是感性与理性兼而有之,具有联结感性-理性分裂、和解感性-理性冲突的能力,是矛盾与对立双方的调节中介。和解只是一种观念上的祈想,仅是一种理想而不是现实。美的理想状态是感性与理性的最终和解以及“实在与形式尽可能最完美的结合和平衡”^②。席勒指出,“这种平衡永远只是观念,在现实中是绝对不可能达到的。在现实中,总是一个因素胜过另一个而占优势,经验能做到的,至多也是在两个原则之间摇摆,时而实在占优势,时而形式占优势”^③,不是缺少和谐一致,就是缺少振奋,不是处在紧张状态,就是处在松弛状态。这种矛盾不仅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并在美学上表现为理想美与经验美之间的矛盾。审美的中和作用,并不是要简单地消除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之间的对立,也不是要取代它们中的任何一方,相反,必须承认彼此间的对立以及各自的存在。这样,二者的统一不是把它们简单地混合而是要划清各自的界限,美要做的恰恰是要把这对“永远也不会合而为一的状态”

① 弗里德里希·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20—221页。

② 弗里德里希·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等译,第129页。

③ 弗里德里希·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等译,第129页。

连结起来。美作为中介,在于通过反思,消除遮蔽与盲视,使它们意识到自己的本性与界限;美之所以可以成为一种中介,并不是它具有重新裁剪感性与理性本身的能力,可以在拆解之后重新组装,其作用在于促使它们显现自身的自然本性。因此,人性的丰富不是简单消解感性或理性,而恰恰是双方都得到丰富与充盈,美的作用在于它以自己的方式导引着人的感性与理性。

结 语

维尔默通过对阿多诺审美现代性方案的重构,旨在超越其内在的“审美主义”与“弥赛亚主义”这对表面悖离却目标一致的理论指向,推动理性走向开放包容。为此,他创造性融合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将艺术真理性奠基主体间性的符号交往解读,揭示艺术形式自身蕴含的交往理性潜能,既回应了哈贝马斯对阿多诺的批评,又为艺术保留了和解功能;同时,借由重构“感性分配”机制,维尔默将美学确立为重塑公共感知结构的“民主伦理学实践场域”,从而在美学层面实现了主体间互动并有效连接了美学与政治民主,既避免了审美乌托邦,又为艺术和解开辟了现实空间,其理论价值在于推动了理性从“单一霸权”走向“多元互动”,使审美经验成为“对抗生活世界殖民化的抵抗资源”。然而,该方案的根本局限在于:美学因其不直接介入具体社会领域,只能以“视域融合”的方式作为“民主政治的补充性力量”发挥辅助作用;尽管维尔默提出了连接美学与政治经济的“后形而上学现代性理论”,但如何将艺术和解功能有效转化为改造社会经济结构的实践路径,其现实可行性仍显薄弱,审美与社会政治经济建立关联并抵达和解事业的现实之途尚存艰辛。

[责任编辑 付洪泉]

Wellmer's Reconstruction of Adorno's Aesthetic Modernity Project and Its Implications

SUN Lin-qiong

Abstract: The early thinkers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embedded a spiritual aspiration in their critique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manifested in Benjamin's use of messianic spirit to resist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in Adorno's insistence on art's mimetic capacity to preserve truth. Wellmer identified these two approaches as a false dilemma between "aestheticism" and "messianism". He reconstructed Adorno's aesthetic modernity project within a post-metaphysical framework. Wellmer transformed Adorno's "art showing a non-reconciled world" into a communicative artistic truth through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cept of truth, emphasizing the inter-subjective dialogue to realize the content of truth; and broke the monopoly of aesthetic rationality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rationality paradigm, advocating the equal symbiosis of multiple rationalities, such as scientific, ethical, aesthetic and so on,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rationality cluster which is polyphonic rather than antagonistic. On the practical level, Wellmer promotes the democratic potential of mass culture, shifting art from elite stronghold to public sphere. On the theoretical level, he replaced linear opposition with "perspectival interpretation", retaining Adorno's critical emphasis on "non-identity" while affirming the value of Enlightenment and embracing postmodern demands for difference. This open and inclusive vision of modernity offers a nonviolent path for integrating cultural conflicts in a globalized world.

Key words: Wellmer, aesthetic modernity, Aestheticism, Messianism